

总 序

...

虽然经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孔子和孟子那里,在西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但是经济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算起,也不过 200 多年的历史。道理非常简单,现代经济学产生的前提必须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里,交易活动是偶然发生的,分工水平是很低下的,“男耕女织”一句话就说明了社会一、二、三产业的分工情况,大量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与中医和西医的分别发展的情况不一样,经济学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的滞后、研究对象的不成熟,中国经济学缺乏产生的土壤。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落后的,其理论创新历来是不足的。但是,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学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国即将成为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国,她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为广大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科学实验场。中国在

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新问题,这又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振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双重使命,我们既面临着挑战,又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可谓适逢“天时”;依托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良好环境,为上海重建国际经济中心提供智力支持,可谓尽占“地利”;在国家教育部和市政府的重点投资支持下,复旦人团结奋进,力争将复旦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可谓独具“人和”。在此高歌猛进的时代,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揽“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必将大有作为。

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套丛书是“十五”期间教育部“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理论的创新”的成果,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们秉承“旦复旦兮,经世济民”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辈卓越的学术传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下求索,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鞠躬尽瘁的结晶。丛书涉及复旦大学所拥有的教育部部分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西方经济学。

徐为民的《权利的轨迹——大转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作者多年来关于政治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以资源配置过程为重点,通过对消费、生产及分配诸环节的互动研究,揭示权利关系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轨迹,并对权利不对称下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了对策性的思考。“没有一个时期的经济像今天这么蓬勃发展,也没有一个时期的社会像今天那么充满矛盾和冲突。”中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不断地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以及我国社会所特有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暴露出来。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都是要研究资源的配置过程的,不过前者主要是从资源配置如何满足市场需要的

角度来研究的,而后者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利益关系或权利关系。徐为民的这部著作回答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有:人们经济利益的分化与经济制度及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趋向及利弊得失,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等等。汪立鑫的《经济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也同样力图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成效。

华民、韦森、张宇燕和文贯中四位经济学家合写的论文集《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从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视角,比较近代中国和西欧社会动态演化的历史轨迹。如华民的“‘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对世界经济重新认识”从人类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出发探讨了最近 1 000 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韦森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运用斯密动力和布罗代尔钟罩这两个概念,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近代西方世界兴起以及晚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提供一些新的解释。同样地,文贯中的“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张宇燕等的“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以及其他几位作者的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和解释了中外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某些特殊现象。

干杏娣的《中国经济崛起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从世界经济演变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角度阐述了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相互作用,论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中国实现大国经济崛起所发挥的作用与所承担的战略角色。尹翔硕等的《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长河中提炼出不同贸易战略的形成

及其实践情况,比较这些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意义,探索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如何实施自己的贸易战略,使中国经济在未来得到更持续的增长。

许少强等的《均衡汇率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是作者长期从事人民币汇率研究的结果。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也就进入一个高潮。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坚持从人民币均衡汇率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做起,讨论处于经济转轨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的运动路径和动态调整,以及在内外均衡冲突条件下的均衡汇率的决定过程,并在与其他经济政策搭配下考虑人民币汇率的调整问题。陈学彬等的《论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是在中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中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改革,通过对我国金融机构中有效激励约束机制改进的讨论,论证了如何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制度和国际接轨,增强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

芮明杰等的《论产业链的整合》考察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企业关联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情况时的产业链的变动,重新界定产业链中各环节对价值创造的贡献。从分工演进的角度,将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相融合,综合分析了产业链整合分化的微观机理,提出基于知识共享的产业链整合理论。郁义鸿等的《产业链纵向控制与经济规制》受中国电信、电力、铁路和民航四大垄断行业的改革实践的启发,研究产业链中的纵向控制和经济规制问题,突破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有关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纵向关系的理论,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横向联系方面展开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而系统完整的产业链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殷醒民的《论技术扩散效应》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特有的产业链现象,为产业经济研究作出了贡献。

张军等的《转型、治理与中国私人企业的演进》围绕转型时期中国私人企业的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这一主题,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对中国私人企业的扩张模式、金融发展、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私人企业集群、企业经理人流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在私人企业扩张模式上,强调“关系”在中国私人企业扩张过程中的作用,以此来刻画转轨时期中国私人企业的扩张路径;在研究了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后,回答了转轨经济下中国家族企业存在的理由并预测了其发展方向。袁志刚等的《中国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福祉》以宏观总供给、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在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各种深层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资源短缺和人民福利增长缓慢等问题也不断涌现,危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其质量。中国经济要获得进一步的增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必须从制度的角度、经济结构的角度和人民福祉的角度对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作深入的考察。

袁志刚

2006年1月23日于复旦园

前 言

...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影响和改变经济增长(短期)与发展(长期)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技术与制度,在一个既无技术进步,也无制度变迁的社会中,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最终都会趋于收敛,因为报酬递减率迟早是要发生作用的。如果说,技术进步可以克服报酬递减率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那么制度变迁的意义则在于它可以创造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不妨把技术进步称之为经济发展之“术”,而把制度变迁称之为经济发展之“道”更为合适。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这种质量上的差别,使得制度成为一个比技术更为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更为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制度变迁所需要的时间总是要比技术进步来得更加漫长,而且还是因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比技术进步来得更加巨大和深刻。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就连技术进步本身也得依赖于制度变革。所以,在我们看来,尽管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要大于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变量或者因素必定是制度。由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这样一个

名称让读者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表明,尽管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制度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自18世纪开始的经济停滞,主要是因为制度僵化而造成的。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制度是如何压制经济增长的。不仅如此,本书还表明,中国僵化的制度不仅压制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对来至于外界的冲击做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反应,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明显的周期性简单复制的特征。在这种周期性简单复制的过程中,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之外,整个社会几乎处在静止状态。因此,只要人口增长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或者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比如来之于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冲击等,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急转直下。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西方社会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对荷兰、英国与法国的比较,读者大致可以看到法国其实也是一个与中国非常相像的国家,它在欧洲也是一个制度惰性比较严重的国家,以至于不得不通过社会大革命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遗憾的是,中国却未能像法国那样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就中国与法国社会的共性而言,那就是它们的那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这样的体制结构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呢?简单地讲,就是制度变革的成本会是非常昂贵的,因为人们形成社会制度变革的共识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中国与法国又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法国的社会是由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一种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则是一种高度内部化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变革远比法国要困难得多。因为在一个高度内部化的,并且又是等级制的社会中,人们推崇的是统治,而不是制度,这就使得制度短缺成为中国的

一种经常状态。所以,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制度变革极为困难的国家,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制度极为短缺的国家,甚至是一个不喜欢制度的国家,而这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自 18 世纪以后走向停滞和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不喜欢制度却是更加喜欢统治呢?这是因为中国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使得人们缺乏外部性概念。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制度源于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能是为正的,也可能是为负的。正的外部性可以为他人带来利益,而负的外部性则必定会给他人带来损害。比如,一个人的随地吐痰行为就有可能增加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染病的概率,这时这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就是为负的。再如,一个乐于把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他人的人,也在制造外部性,但是,与随地吐痰这种行为相比,这种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显然是为正的。除了个人之外,社会中的许多组织和机构也都是外部性的制造者,比如企业的排污行为所产生的显然是增加社会成本的、负的外部性,又如会计事务所为客户炮制虚假的财务报告所产生的显然也是负的外部性。因此,为了减少人类参与社会活动时必定会产生外部性,特别是那种有损于他人利益的外部性,我们就必须建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因为有效的制度可以抑制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机会主义行为或损人利己的行为,从而使外部性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假如没有外部性概念,那么就不会有制度,而只会有强权。任何强权都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会窒息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变革。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缺乏外部性概念呢?这可能是由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形成的唯我独尊和唯我独“中”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已经文明化的国家,并长期

处在一系列落后的、尚未文明化的国家包围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央之国。正是这种民族优越感导致中国逐渐形成了唯我独尊和唯我独“中”的世界观。受这样的世界观支配,中国人多习惯以我为中心。所以,在中国,人们不太考虑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平等关系,也不太考虑由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是否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其结果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的规则不是通过制度来加以规范的,往往是借助于强权来展开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弱肉强食和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有作为内生性制度的道德与伦理,但是,这种道德和伦理维护的是等级制的权力关系,而不是用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所以它既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帮助,也不会社会的动态发展中激发新的制度创新。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所要完成的社会变革与其说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还不如说是从根本上实现从统治社会向制度社会转型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揭示中国社会转型的这样一种本质,正是本项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华 民

2006 年 4 月于复旦

目 录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	华 民 (1)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	
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	韦 森 (31)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	
“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韦 森 (63)
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	
——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	
猜想	张宇燕 高 程 (107)
中国自陷于农本社会怪圈的经济地理学析解	文贯中 (181)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来自 17 世纪荷兰的	
启示	陆寒寅 (227)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	
实录	陆寒寅 (254)
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法国历史上的“为与	
不为”	陆寒寅 (284)
13—16 世纪意大利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孟 俭 袁文瑾 (313)
清代前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刘军梅 孙宗佩 (336)

“马尔萨斯制约”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

华 民^{*}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最近 1 000 年中,西方国家的兴起与东方国家相对衰落的原因。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第二部分引入“马尔萨斯制约”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第三部分首先介绍了马尔萨斯本人的答案,并回答了人类突破这一制约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人类如何用征战与掠夺、贸易、工业化等方式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第四部分讨论了古代文明、荷兰等国的衰落与英国的崛起,论证说缺乏理性的国家难以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第五部分对我国宋代以后停滞不前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棘轮效应”的存在阻碍了古代中国的发展。最后讨论了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邓小平效应”,由此得到的基本结论是:由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是依靠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

^{*}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200433,021-6564-3349,huamin@fudan.edu.cn。

是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举的发展战略有效地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束缚,从而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 马尔萨斯制约 棘轮效应 邓小平效应

一、导论

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最近的1 000年中,西方国家富起来了,而原来富裕的东方国家却变得相对贫困了?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有时是相互补充的,有时又是相互冲突的看法。比如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决定论、马克斯·韦伯的宗教决定论、布罗代尔的技术决定论、彭慕兰的资源决定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国际剥削论,以及威廉·麦戈伊的文化技术决定论等,为我们理解东方世界为何衰落和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兴起提供了多方位的观察视角。

在分析西方经济发展的原因时,人们一般马上会想到的是技术发明,而不是各种新制度的建立,然而就如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部新编经济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是新制度的建立对西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在各种各样的新制度中,财产权的制定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自从有了财产权,西方传统的财产没收就被税赋征收所替代,这种变化使得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美〕道格拉斯·C·诺斯和罗伯特·保罗·托马斯,1973;罗森堡·小伯泽尔,1985)。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种制度上的变革源于宗教的改革,尽管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说过新教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是他始终认为新教是使西方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最为显著的特

点之一,因为新教使得基督教摆脱了巫术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们可以理性地对待社会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韦伯所定义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布罗代尔并不否认制度因素在西方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与马克斯·韦伯不同,他认为把欧洲经济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于欧洲拥有工具和建制的优势,即拥有证券交易和各种形式的信贷。这种优势导致欧洲经济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而不具有这种优势的其他地区要么处在传统的市场经济,要么处在更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从而造成了欧洲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距(〔法〕布罗代尔,1976)。

美国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从区域经济比较的角度(他认为这样更加具有可比性)对西方兴起与东方衰落的原因做了独到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他发现,像中国这样非常典型的东方国家之所以与工业化无缘,关键的问题就在于经济增长受到了资源的约束,以至在农村劳动报酬递减、自由劳动大量产生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更加劳动密集的社会分工来吸收社会的剩余劳动,从而失去了发展现代大工业,并且依靠大工业的发展来推进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可能性。相反,欧洲几个重要地区(如苏格兰低地、德国的鲁尔区等)却因为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而迅速地发展起了现代的大工业。结果,在西方成功地发动工业革命以后,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东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大分流”。

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注重政治因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赞成用抽象掉政治因素的纯经济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分析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及演进。通过导入政治因素,他们发现,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导致这种结构产生的关键因素就是,走出中世纪以后,在西方世界,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迅速发展起来了;而东方国家则由于地方群体的利益过于分散

使得国家机器非常弱小,国家机器力量上的这种巨大差距最终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等级制结构,并在 1640 年左右稳定下来。按照沃勒斯坦的描述,这种等级制的结构由处在中心地位的核心国家和处在外围或者半外围地位的边缘国家所组成。其中,核心国家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对处在相对劣势的边缘国家进行“国际剥削”而富裕起来,其方法就是所谓的“不平等交换”。因此,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除非对世界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再造,否则那些处在边缘地区的国家将会陷入永远也无法赶上来的不利境地(〔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03)。

威廉·麦戈伊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东西方发展的不同走向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在麦戈伊看来,人类文明起源于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随着文字(文化)技术的演变,人类文明也就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进入更加高级的发展阶段。根据麦戈伊的划分,象形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字母拼音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阶段;15 世纪中叶,印刷术传至欧洲成为文化的主宰;进入 20 世纪以后,能够记录和传播视听图像的技术和设备被发明和创造出来了,人类文明因此而进入文字后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从 1990 年开始,随着电脑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人类文明又开始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新纪元。以文化技术的变化为主线,麦戈伊认为,东方的象形文字文明由于文字,从而也就是文化学习的成本过高,并且容易被少数人所垄断,以致造成社会政治与经济的集权化发展,而在一个集权化的社会中,不仅社会的创新活动会趋于枯竭,也不利于动员人民群众来参与经济发展。与此相反,西方的字母拼音文字技术再加上印刷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学习文字(文化)、进行思想和技术传播的成本,并且使得文化上的垄断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垄断不再成为可能,进而引发民主政治和技术创新。于是就有了 15 世纪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英〕威廉·麦

戈伊,2004)。

所有以上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经济丰富的知识,但同时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于那些经济增长落后、贫困现象司空见惯的大部分非欧洲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像欧洲国家一样走上富裕之路至今仍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本文从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讨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如何发展的,并且力求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以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可行的道路。

二、“马尔萨斯制约”: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在已经过去的100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倍,世界GDP提高了近300倍。这与在此之前的那个1000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世界人口仅增长了六分之一,而人均收入并没有任何提高([英]安格斯·麦迪森,2003)。

为什么在两个1000年中人口增长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布罗代尔(1997)对此的解释是:“人丁系统被围在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圈子里。人口数量刚要触及圈子的周边,几乎马上就出现退缩。恢复平衡的方式和时机并不缺乏:匮乏、灾荒、饥馑、苦日子、战争,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种种疾病。”那么布罗代尔所说的这个不可捉摸的圈子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所说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制约。马尔萨斯在与戈德温和孔多塞的辩论中强调指出,人口将会不断地超过食物的供给,所以人类进步既不会迅速地,也不会无限制地实现([英]约翰·伊特韦尔,1992)。人类进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呢?马尔萨斯的推理是,人口不受限制时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将按照数学级数增长。为了防止人口超过可得到的食物供给,就会有中期性的战争、

灾难和疾病(〔英〕迈克尔·帕金,2001)。我们把由马尔萨斯发现和提出的这种人口增长将受到有限食物制约的现象称为“马尔萨斯制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口稀少,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约束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马尔萨斯制约”,而是由人类本身欠发展所带来的行为和认知能力的约束。从欧洲国家来看,真正的“马尔萨斯制约”大概发生在公元1300年至1400年间。公元1300年时,西欧的人口猛增到5800多万,迅速触及了布罗代尔所说的圈子的边界,这意味着人口增长开始受到“马尔萨斯制约”。结果,西欧的人口急剧下降,到公元1400年时,西欧人口存量只有4100多万,期间的人口复合增长率为 -0.34% ,西欧的人口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而受到重创。经过100多年的调整以后,西欧的人口才重新恢复到公元1300年的水平(〔英〕安格斯·麦迪森,2003)。

尽管人类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着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努力,但是,旧的“马尔萨斯制约”被突破了,新的“马尔萨斯制约”又产生了。在整个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旧的、来自于食物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渐渐地演变为新的、来自于整个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性资源有限性的“马尔萨斯制约”。这一变化表明,“马尔萨斯制约”不仅适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也适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每一种自然资源。因此,尽管马尔萨斯的预言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是,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坐在“人口炸弹”上,处在自然资源有限的压迫下。所以如何控制人口增长、节约甚至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仍旧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并且,更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和部分国家的富裕而得到根本上的缓解。

对此,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威廉·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一书中曾

经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用曲线图来表示这样一些力量。其中之一是人口曲线。……在过去五十年中，更是以令人眩晕的高速直线上升。另一曲线图是资源。……最近一百五十年来，曲线的方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像瀑布一样向下直泻。这两条曲线历来都是相交的，但现在它们却越来越快地分离。两条曲线离得越远，要把它们重新拉在一起也就越困难。……如果人类不能根据有限的资源数量来全面调整生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过文明生活的一切希望，准备着以不可遏止的速度陷入战争的深渊，回复到野蛮时代。”（〔美〕威廉·福格特，1981）

三、突破“马尔萨斯制约”的两种不同方法：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

马尔萨斯观察到了人口增长会受到食物有限的制约，当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又进一步观察到了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不可再生资源有限的制约。所有这些发现给人类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来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以及经济增长和有限资源利用上的均衡。

马尔萨斯本人是主张通过积极的道德上的抑制来实现人口零增长的。其中，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就是死亡率的上升，造成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人口过度增长所引起的工资率的下降（其背后隐含的事实就是食物供不应求），随着工资的下降，灾难和饥饿大量发生，从而导致死亡率的上升和人口数量的减少，这样的调整过程会持续到人口零增长、工资水平恢复到维持现有人口生存水平的状态才停止。所谓道德上的抑制，马尔萨斯有时也把它定义为消极的抑制，其方法就是控制出生率，而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控制出生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晚婚或禁欲（〔英〕D·R·韦尔，1992）。